

中國文哲論集13】

元代經學國際研討會 論文集

上

主編●楊晉龍
執行編輯●陳淑誼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

中國文哲論集⑬

元代經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上)

主 編

楊 晉 龍

執行編輯

陳 淑 誼

臺北 南港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印行

2000年10月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中國文哲論集⑬

元代經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主 編 楊 晉 龍
執行編輯 陳 淑 誼

發 行 者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
臺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 2 段 128 號
電話：(02) 27883620

印 刷 者 辰 益 出 版 有 限 公 司
永和市竹林路 201 巷 24 弄 8 號 2 樓
電話：(02) 29280954

定 價 精裝本（上下兩冊） 新臺幣 820 元
平裝本（上下兩冊） 新臺幣 720 元

中華民國 89 年 10 月初版

中華民國 91 年 12 月再版

ISBN 957-671-723-X （精裝）

ISBN 957-671-724-8 （平裝）

出版說明

本處成立於一九八九年八月，次年正式聘請研究人員，推展研究工作。初期的研究方向有五：（一）古典文學方面：著重於古典詩歌、散文、小說、戲劇、文學理論等之研究。（二）近代文學方面：著重於清代中葉以來的白話文學、民間文學、中外文學關係與近現當代文學相關問題之研究。（三）經學文獻方面：著重於經學文獻、經學史、經學與文學、哲學關係之研究（四）中國哲學方面：著重於先秦諸子、中國歷代重要哲學思想及哲學與文學關係之研究。（五）比較哲學方面：著重於中外哲學思想之比較及近代哲學相關問題之研究。

爲推展這五個方面的工作，本處出版期刊和專刊兩方面的出版品。期刊有《中國文哲研究集刊》（半年刊），刊載本處同仁及海內外知名學者的單篇論文；《中國文哲研究通訊》（季刊），報導本處的學術活動，和國內外中國文哲研究現況。專刊有《中國文哲專刊》，出版本處研究人員之專門研究著作；《近代文哲學人論著叢刊》，輯印前輩學人之手稿；《中國文哲論集》，出版本處各次學術會議的論文集；《圖書文獻專刊》，出版本處研究人員策畫編輯之目錄索引；《珍本古籍叢刊》，蒐集海內外珍本古籍，影印流傳。《古籍整理叢刊》，點校、整理各種古籍，重新排印出版。另有爲各種專題計畫所設的叢刊，如《孟子學研究叢刊》、《當代儒學研究叢刊》等。各專刊合計已出書三十餘種。

本處曾於一九九二年十二月二十二、二十三日舉辦「清代經學國際研討會」，一九九五年十二月二十二、二十三日舉辦「明代經學國際研討會」。兩次研討會之論文集先後皆已出版。爲推展元代經學研究，又於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二十二、二十三日舉辦「元代經學國際研討會」，有國內、大陸、日本、美國等地學者、研究生一百餘人參加，計發表論文二十六篇。

會議結束後，由本所助研究員楊晉龍擔任本書主編，經學研究室助理陳淑誼小姐擔任執行編輯，經送審、修改、定稿，再送廠打字、印刷，花費將近兩年之時間。

編輯期間，除主編楊晉龍先生、編輯陳淑誼小姐積極任事外，近代史研究所呂妙芬小姐協助處理英文文稿，九州大學博士金培懿小姐協助處理日文文稿，另東吳大學的黃智明先生、張穩蘋小姐、葉純芳小姐、何淑蘋小姐協助校對所有文稿，在此一併致謝。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

二〇〇〇年十月

目次

上 冊

出版說明	1
目次	3
導言：元代經學史的奠基與新猷	楊晉龍 1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Civil Service Curriculum Between 1250 and 1400 and the Role of the Yuan Dynasty in Classical Studies -----Benjamin A. Elman (艾爾曼)	23
南宋至明初科舉科目之變遷及元朝在經學歷史 的角色	艾爾曼著、呂妙芬譯 71
元代經學的社會歷史背景和程朱之學的發展	夏傳才 119
經學家許衡——其思想的特質	福田殖著、連清吉譯 145
元代《易》學平議	黃沛榮 159
胡方平、一桂父子對朱子《易》學的詮釋	鍾彩鈞 195
吳澄的《易》學	詹海雲 237
吳澄《易》學研究——釋象與「象例」	楊自平 269
董真卿《周易會通》在「復古《易》運動」中的意義	許維萍 305
吳澄的《尚書》學述要	蔡方鹿 337
王充耘的《尚書》學	蔣秋華 363
論陳櫟《書解折衷》與《書蔡氏傳纂疏》對《書集傳》的態度 ——駁正《四庫全書總目》的誤解	許華峰 395
董鼎《書蔡氏傳輯錄纂註》對蔡沈《書集傳》的疏釋	陳恆嵩 425

下 冊

元代《詩經》學初論	張宏生	453
劉瑾《詩傳通釋》淺說	趙沛霖	469
《詩傳大全》與《詩傳通釋》關係再探		
——試析元代《詩經》學之延續	楊晉龍	489
〈冬官〉未亡說之流行及其意義	小島毅著、連清吉譯	539
評元代吳澄對《禮記》的改編	姜廣輝	559
黃澤論《春秋》書法——《春秋師說》初探	張高評	579
趙汭《春秋金鎖匙》初探	馮曉庭	625
黃震の《四書》學	神林裕子	659
黃震的《四書》學研究	神林裕子著、張文朝譯	685
元儒陳天祥對《四書集注》的批評	林慶彰	705
許謙《讀論語叢說》序說	廖雲仙	721
朱熹至元儒對《大學》的解釋及所謂「朱陸合流」問題	金春峯	761
陶宗儀《說郛》百卷本流衍考		
及其讖緯輯佚之文獻價值評議	黃復山	795
附錄 「元代經學國際研討會」議程表		837

導言：元代經學史的奠基與新猷

楊晉龍*

一、前賢對元代經學評價析論

元代經學若是從「傳承」的淵源論，自是「宋學」的遺緒，且以程朱一系的學統為主。明末的陳邦瞻（？—1623）在《元史紀事本末》中曾引錄元末明初的王禕（1323—1374）^①評論元儒金履祥（1232—1303）、許謙（1270—1337）在元代傳播程朱一系道學的功績云：

程氏之學，至朱氏而始明；朱氏之道，至金氏、許氏而益著。使百年以來，學者有所宗鄉，不為異說所遷，而道術必出於一，可謂有功於斯道矣。大抵儒者之功，莫大於為經，經者；斯道之所載焉也。有功於經，即其所以有功於道也。金氏、許氏之為經，其為力至矣，其於斯道，謂之有功，非耶？

陳氏引錄其說而未加駁斥，顯然同意王禕的說法，也就是肯定金、許二氏於經學上用力，且於程朱學之傳播有功的評論。尋繹王禕的語意，應該可以推論金、許二人係因在「為經」上用力，故乃能傳播程朱學於當代，若

* 楊晉龍，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助研究員。

①按：「王禕」一般作「王禕」，生卒年多作「1322—1373」，此依何冠彪之考證。見〈王禕二題〉，《明清人物與著述·人物篇》（香港：香港教育圖書公司，1996年），頁1—13。

此推論不算大誤，則王、陳二人顯然肯定金、許二儒在經學上的成就。稍後的張溥（1602—1641）也順著王禕的評論云：

北方之學，起自趙復、許衡；尊而明之者姚樞、竇默也。儒者世繼，傳人不絕：世祖時，有容城劉因；成宗時，有蘭谿金履祥、奉元蕭料、緱山杜瑛；文宗時，有崇仁吳澄；順帝時，有休寧陳櫟、婺源胡一桂、金華許謙、資州黃澤之倫。咸明道學、修經傳，濂、洛、關、閩，家諷戶習，著述之盛，冠於「儒林」，入祿國而皆章甫，莫能議也。^②

王禕僅肯定金、許二儒，張溥則全面性肯定元儒「修經傳」「著述之盛」的經學功績，舉明初與明末之論，大約可以見明人對元代經學的評價：以程朱為宗，著作多而有功於經學。紀昀（1724—1805）等奉敕編纂，完稿於乾隆四十七年（1782）左右的《四庫全書總目》，除在〈經部總敘〉中評論云：

洛、閩繼起，道學大昌，擺落漢、唐，獨研義理。…學脈旁分，攀緣日眾，驅除異己，務定一尊，自宋末以逮明初，其學見異不遷。

以為元代經學一尊洛、閩。另外更舉《詩經》為例，以說明元代經學的傳承與影響云：

自北宋以前，說《詩》者無異學。歐陽修、蘇轍以後，別解漸生；鄭樵、周孚以後，爭端大起。紹興、紹熙之間，左右佩劍，相笑不休。迄宋末年，乃古義融而新學立，故有元一代之說《詩》者，

②王禕、張溥之論，見〔明〕陳邦瞻著，〔明〕張溥增刊：《元史紀事本末·諸儒出處學問之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7月影印〔清〕光緒〔1875—1908〕年間廣雅書局刊本），卷16，頁37。

無非朱《傳》之箋疏。至延祐行科舉法，遂定為功令，而明制因之。…然元人篤守師傳，有所闡明，皆由心得。^③

認為元代詩經學全以朱《傳》為宗主，遂成科舉功令，並因而影響到明代。但也承認元人的經解雖「篤守師傳」，然多為「心得」之見，非苟為「剽竊」而已。今人徐梓（1962—）則從元代書院一般學規、課本以朱子之說為主、及祭祀朱熹（1130—1200）及其門人的普遍現象，進而認為：

在元代，讀朱子之書，學朱子之學，已不單純是一種學術風氣，而可以說是一種社會時尚。…不僅是讀朱子之書，學朱子之學，而且還以朱子的是非為是非，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說元代學術是朱學的天下也無不可。^④

這一研究更坐實前述元代獨尊朱學的論斷，所以元代經學以「述朱」為主，應該是個沒有爭議的共識。

元代經學「述朱」的程度如何？相應的經學成果價值高低如何？這纔是經學史研究者應該討論的主題。前述諸家的論斷，均較傾向正面的肯定，即使如《四庫全書總目》這類稍偏於漢學家立場的評論，雖然也有批評元代學者過崇朱子，遂將其書之「一字一句奉為經典，不復究其傳述之真偽」的「黨」之流弊，然猶有肯定元儒為學與經學「篤實」之論，^⑤於

③〔清〕紀昀等纂：《四庫全書總目·經部總敘》（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10月斷句本），卷1，頁1上；《詩經大全提要》，卷16，頁128下。

④徐梓：《元代書院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1月），頁175。

⑤見《四庫全書總目·四書管窺提要》，同③，卷36，頁301中；「黨」弊見《經部總敘》，卷1，頁1上；稱「元儒篤實」，見《詩演義提要》，卷16，頁128上；《詩解頤提要》，卷16，頁128中；《四書經疑貫通提要》謂「有元一代，士猶篤志於研經」，卷36，頁300中；《元儒考略提要》，卷58，頁525上；《俟菴集提要》，卷167，頁1447中等。以上均利用陳郁夫教授貼於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館的免費蒐尋網站「寒泉」檢索而得，謹此致謝。又〔清〕柯劭忞（1878—1933）：《新元史·儒林傳序》（北京：中國書店，1988年8月影印1930年定本）亦肯定「元

元代經學固已有不滿之意，猶非全以負面評價視之。惟時代稍早的姚際恆（1647—？）實已有元人和唐、宋人《詩》解少佳者，所以「似亦不必刊也」的負面評價出現。^⑥藐視元代詩經學的意思明顯，但此猶僅評論《詩經》一經而已。乾嘉時期的江藩（1761—1830）以漢學家的立場，遂有全面否定元代經學之論，江氏云：

經術一壞於東、西晉之清談，再壞於南、北宋之道學，元明以來，此道益晦。^⑦

江氏之書，頗受推崇，流傳亦廣，影響不小；更後的皮錫瑞（1850—1908）出，以崇重漢代今文學的立場作論，於是整體否定元代經學的評價益明，皮氏云：

論宋、元、明三朝之經學，元不及宋，明又不及元。…宋儒學有根柢，故雖撥棄古義，猶能自成一家。若元人則株守宋儒之書，而於注疏所得甚淺。如熊朋來《五經說》，於古義、古音多所抵牾，是元不及宋也。^⑧

之儒者，服膺朱子之學；篤信謹守，言行相顧。…足以通《六經》之大義，傳孔孟之心法」，卷234；頁905中。

⑥〔清〕姚際恆：《詩經通論·詩經論旨》（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8年1月影本），頁5。

⑦〔清〕江藩著，鍾哲整理：《國朝漢學師承記》（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12月），卷1，頁5—6。又繆荃孫（1844—1919）編纂，題江藩纂：《經解入門，歷代經學興廢》（天津：天津市古籍書店，1990年6月影印1932年文化學社版）一書，亦謂「宋初承唐之弊，而邪說詭言，亂經非聖，殆有甚焉。…至於濂、洛、關、閩之學，不究禮樂之源，獨標性命之旨，義疏諸書，束置高閣，而經學一廢。元、明之際，以制義取士，古學益絕。」卷2，頁33，可同觀之。謂《經解入門》係繆荃孫編撰者，見周予同（1898—1981）：《中國經學史講義》（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9年1月），頁5，引顧頡剛（1893—1980）的意見。

⑧〔清〕皮錫瑞著，周予同註：《經學歷史，經學積衰時代》（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4年9月影本），頁283。

皮氏剿襲《四庫全書總目》之意，^⑨予以澈底的負面評價化，故以熊朋來（1246—1323）《五經說》中一、二誤說為例，而不論其「禮學」成就；又刻意不取元代經術最深的黃澤（1260—1346）經解為說，^⑩此見皮氏偏頗之一面，毋怪章太炎（1869—1936）要說他「妄以己意裁斷」了。然皮氏之作實為「用會通的眼光來寫中國經學史的第一人」，此書「還是有一讀的價值」，^⑪因其書流傳甚廣，影響之大，實難估計。此後經學史的相關研究者，不是承襲《四庫全書總目》之說，^⑫就是發揮皮氏《經學歷史》的見解，^⑬其間雖有劉師培（1884—1919）「元代學術，亦彬彬可觀」「元

⑨章太炎：〈駁皮錫瑞三書〉云《經學歷史》「持論多以《四庫提要》為衡」，並謂《四庫全書總目》之論「多兩可，不足以明古今文是非」，見《太炎文錄初編·文錄》，收入徐復等點校：《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9月），卷1，頁20；又謂皮氏《經學歷史》「鈔疏原委；顧妄以己意裁斷」。不以章氏之論為然，且謂皮氏「引用《四庫提要》，這也是不得已的辦法，我們似應該加以原諒」的是周予同，見朱維錚編：《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經學史與經學之派別·皮錫瑞《經學歷史》序》（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7月增訂版），頁101。

⑩《四庫全書總目·東山存彙提要》謂：「有元一代，經術莫深於黃澤」，同注3，卷168，頁1461下。〔明〕宋濂等撰：《元史·儒學傳二·熊朋來傳》（臺北：鼎文書局，1995年8月影印點校本），第7冊，卷190，頁4336，謂熊氏「諸經中《三禮》尤深」。

⑪周予同：《中國經學史講義》，同注7，頁5。

⑫稍舉數例，依出版年代先後列出，如：劉師培：《經學教科書》，收入《劉申叔遺書》（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3月），頁17a—22a，總頁2082—2085；錢基博（1887—1957）：《經學通志》（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78年9月影印1936年版），見〈詩志〉，頁105—106即知；甘鵬雲（1861—1940）：《經學源流考》（臺北：廣文書局，1977年1月影印1938年版），頁91引《四庫提要》之論；葉國良先生等編：《經學通論》（臺北：國立空中大學，1996年元月），頁592—596，係融會《元史·儒學傳》與《四庫全書總目·經部》相關諸書的「提要」而成。

⑬依年代先後，舉數例以明之，如：〔日本〕本田成之（1882—1945）：《支那經學史論》（東京：弘文堂，1927年）、孫俚工譯：《中國經學史》（臺北：廣文書局，1979年5月影印上海：中華書局，1935年版），頁252—253；〔日本〕小柳司氣太（1870—1940）著：〈元明的經學史〉，收入〔日本〕諸橋轍次編，連清吉、林慶彰先生合譯：《經學史》（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1996年10月翻譯1933年版），頁173—182；

人經術之尚心得」等較正面的評價，^⑭惟此少數微弱之聲，終不抵多數承襲之先見，於是元代經學缺乏研究價值的「成見」，深入學者的潛意識之內，成為不可更改的「定論」。由於受到此種定見的影響，再加上元代國祚短促、統治的蒙古人文化水準又不高等等相關因素的交互影響，願意投入元代經學相關研究者自然不多，因此至今為此，還沒有一部比較深入探討元代經學史的論著出現，甚至連深入研究單一經籍的「元代某經學史」也未出現過，元代經學遂與明代經學成為中國經學史上最不受重視、研究成果最少的荒漠之區。^⑮近來學者固已開始進入「實事求是」的研究，遂

周予同：《群經概論》（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8年10月影印1933年版），頁19謂「元、明兩代成為經學史上的衰落時期」；馬宗霍（1897—1976）：《中國經學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2月影印1937年版），頁127—134；蔣伯潛（1911—1944年前後）：《經與經學》（臺北：世界書局，1975年6月影印1941年版），頁201—210；裴普賢先生：《經學概述》（臺北：臺灣開明書店，1969年），頁246；程元敏師：〈程敬叔的讀經法〉，《孔孟月刊》第8卷第5期（1970年1月），頁17；夏傳才先生：《詩經研究史概要》（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1993年7月；原1982年9月初版），頁188；周良霄、顧菊英：《元代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頁712；夏傳才先生：《十三經概論》（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1996年6月），頁63—64；章權才：《宋明經學史》（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頁273等等。又王靜芝：《經學通論》（臺北：國立編譯館，1982年2月），頁99〈緒論〉中，甚至連元代經學也未介紹；楊成孚：《經學概論》（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94年5月），在〈經學史要略〉中，也無元代經學，此二書大約因受元代經學「所得甚淺」（皮錫瑞語）、「不足稱述」（裴先生語）一類評價影響，故略去不提。從上述徵引的部分現今還流行的書籍，多少受到皮氏否定元代經學價值的影響來看，則元代經學相關研究之不振，也就可想而知了。

⑭劉師培：《國學發微》，收入《劉申叔遺書》，同⑪，頁47a—47b，總頁500。按劉氏《經學教科書》頗受《四庫全書總目》的影響，故還有少數負面判斷語，此則多正面肯定語，其論明代經學亦同。

⑮根據筆者依林慶彰先生主編：《經學研究論著目錄（1912—1987）》（臺北：漢學研究中心，1989年12月）、《經學研究論著目錄（1988—1992）》（臺北：漢學研究中心，1995年6月）等二書之初步統計，自1912年至1992年的80年間，與元代經學相關的論著，不超過70篇。再則筆者統計1949到1998共50年臺灣《詩經》相關研究的論著，專論元代的也僅有單篇論文一篇，見拙稿：〈臺灣近五十年（1949—1998）

反省、質疑皮氏等相關負面評價的是非，^⑩乃逐漸有肯定元代經學價值的言論出現，^⑪然影響效果似乎不大，蓋長期以來形成的「刻板印象」，確實無法在一朝一夕之間完全改變，為有效矯正學術界對元代經學評價不合實際的成見，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乃召開「元代經學國際研討會」，冀望藉由實際的研究成果，以證實或駁正前賢有關元代經學的評價，作為元代經學史研究或發展的基礎，這是舉辦此次會議的主要目的。

詩經學研究初稿》，2000年元月本處例行論文發表會。可見元代經學相關研究不受重視，研究成果甚少。

⑩如：林慶彰先生：〈經學史研究的基本認識〉、張志哲：〈中國經學史分期意見述評〉二文，皆認為以「積衰」來稱元代經學，值得商榷。二文收入林慶彰先生編：《中國經學史論文選集》（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2年10月），頁5、頁17。

⑪如：〔美〕田浩著，黃振華譯：〈金代的儒教——道學在北部中國的印跡〉，《中國哲學》第14輯（1988年1月），頁107—141，認為金代的儒者對道學始終持批判態度，進而影響到元代程朱學的性質，元代朱子學者比朱子更強調實際和修身，不太重視形上學，且更有兼容並蓄的態度。趙吉惠等主編：《中國儒學史》（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6月），頁663—664，以為元儒皆重視經典的研讀，雖側重義理的發揮，然一般不墨守「先儒」之說，敢對經典提出疑難。林葉連兄：《中國歷代詩經學》（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3年3月），頁322，謂元朝科舉有兼用古注疏之科目，故元代經學雖側重朱學，惟尚不廢漢唐之學，不過他也沒完全擺脫皮氏《經學歷史》的束縛。秦志勇：《中國元代思想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4月），頁7，認為劉因（1249—1293）提出的「古無經史之分」的看法，非常重要；又說元代理學不僅繼承兩宋而已，實則有所發展，彌補了宋代理學的某些不足。此雖論理學，然其表現在經典的詮解上，故亦可視為對經學之評價。步近智、張安奇也認為元代多數儒者看到了朱、陸兩學派的異同和長短，試圖舍短取長，因而轉向道德踐履之實學，此於《大學》的詮解上最明顯，另外劉因提出重視漢、唐注釋之學的見解也十分重要，見《中華文明史》編纂委員會主編：《中華文明史·元代卷》（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6月），頁269—287。羅立剛：《宋元之際的哲學與文學》（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9年6月）一書中，認為修《元史》的史官們雖知元代以尊重朱學為特色，然也不認為國子監是純粹的朱學；元代的朱學者固少有新見，但也能為朱子拾遺補缺，對朱子等理學家的論述多能再進一步的闡發；新安學者在著作形式上，崇重章句訓詁之實，頗有從宋學回歸漢學返樸歸真的要求；整體而言，他們頗有意要突破朱學的樊籬，見頁48—62所論。

元代經學既然至今猶未有全面而深入的研究成果出現，則元代經學何以會有缺乏研究價值等一類負面的評價？查考此類負面評價出現的原因，除因「漢學」、「宋學」內在價值標準不同，因而形成的門派偏見之外。更由於缺乏實際的研究成果作為依據，因而僅能承襲前人既有的評價下判斷，並且也無更確實的依據評判前人評價的是非，所以纔會出現或承襲《元史·儒學傳》、或襲用《四庫全書總目》、或發揮《經學歷史》見解的情形，^⑮這實在是無可奈何的選擇。但是前述三書的評價，誠如周予同（1898—1981）批評《四庫全書總目·經部總敘》和龔自珍（1791—1841）〈與江子屏書〉的歷代經學分派所言，祇從「經學」繼承的形式：即繼承關係與某些特點著眼。^⑯這些論著所重的都是在「推原統緒」、「揭其流派或學派」，說明諸學者「淵源有自」的傳承關係。所以會有這種要求，主要與經學本身的特殊性質相關，蓋經學最重源流，《四庫全書總目》即

⑮考求元代經學的實情，雖周予同以為《宋元學案》和《明儒學案》「對於研究思想史、哲學史還可以用，但搞經學史是不夠用的」，見《中國經學史講義》，同⑦，頁7。但也只是「不夠用」，相信現代的研究者，也會參考二《學案》相關部分立論，因筆者未曾深入瞭解，故未列出。實則二《學案》中所言，於經學史研究，頗有助益，如：〔清〕全祖望〈宋元儒學案序錄〉所謂：「有元立國，無可稱者，惟學術尚未替。上雖賤之，下自趨之，是則洛、閩之沾溉者弘也」，可知元代朱學實自下發之，延祐科舉以朱學為官學，不過順其勢耳。見〔清〕黃宗羲、全祖望撰，吳光點校：《宋元學案》，收入沈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1月），第3冊，〈卷首〉，頁46—47。又如全祖望〈靜清書院記〉謂史蒙卿（1247—1306）「雖宗主朱學，而其獨探微言，正非墨守《集傳》、《章句》、《或問》諸書以為苟同者」，史氏正是寫作《讀書分年日程》（即《讀書工程》或《進學規程》）的程端禮（1271—1345）之師。見魏得良點校：《宋元學案·靜清學案》，第6冊，卷87，頁426—427。原文見全祖望：《鮚埼亭集·外編·甬東靜清書院記》（臺北：華世出版社，1977年3月影本），下冊，卷16，頁873—874。另外全氏文集中亦有不少可供參考的資料，治元代經學者似不應忽之。

⑯周予同、湯志鈞合著：〈關於中國經學史中的學派問題〉，朱維鈞編：《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同⑨，頁671—673；又見湯志鈞：《經學史論集》（臺北：大安出版社，1995年6月），頁288—290。

有「儒者講求古義，務得源流，稍篤實者，皆不敢竄亂舊文」的見解，^②皮錫瑞更進一步指出經學學者以「篤守古義，無取新奇；各承師傳，不憑胸臆」為研究正軌，所以說：「凡學皆貴求新，惟經學必專守舊」，^③因此諸書重視「先河後海」等承繼關係的探討，毋寧是正常且必要的。

惟從今日的要求而言，筆者以為經學史的研究，至少要顧及三個重要層面：繼承、發展和影響。「繼承」是溯源尋根的工作，所以重其「同」；「發展」是創造發明的研究，故重其「異」；「影響」是傳播流衍的探討，因而重其「傳」。欲知一代經學之特色，除「繼承」的溯源研究外，最重要的是能指出其發展的特色，也就是相對於所承繼的學術成果，是否有糾正、補充或發明之處；這些糾正、補充和發明是正面的或是負面的，對當代或後世所造成的影響如何？要瞭解這些問題，最確實有效的方法，當然是先就各家、各書作比較深入的分析後，再進一步結合相關的研究成果，最後纔有可能得出比較可信的結論。元代經學相關的研究，固然已有一些成果，但如以前述比較理想的要求，衡量現有對元代經學評價諸論，就會發現多數評論者不是先有成見的判斷；就是流於印象式的抽象敘述；甚至只是承襲前人的陳說而已，真正深入而合乎「實證」要求的篇章，實在少之又少。為彌補這類缺憾，期待有更多具有實證價值的元代經學史相關論著的出現，這也就是文哲所籌備處舉辦此次「研討會」的另一個重要原因。

二、會議論文內容舉要

「元代經學國際研討會」有來自大陸、美國、日本和臺灣等二十六位學者發表論文，依論文涉及的經典和性質，大約可以分成十類：

^②見《四庫全書總目·天文鬼料竅提要》，同③，卷110，頁937下。

^③見《經學歷史》，同⑧，頁139、頁220。

(一)經學綜論

有二篇論文，探討科舉科目、程朱學的發展與元代經學的關係。一是艾爾曼（Benjamin A. Elman）的〈南宋至明初科舉科目之變遷及元朝在經學歷史的角色〉，探討科舉科目變遷的事實及其隱含的內在意義。指出即使在道學爲主的朝代，「道學」並沒有完全壓倒「文學」的地位，科考一直是「文」、「道」並重。元代士人經由經學在科考中地位的轉變，獲得心靈上認爲的文化勝利；異族則透過對經學的認同，取得政權的「合法性」。一是夏傳才的〈元代經學的社會歷史背景和程朱之學的發展〉，指出元朝對儒學的提倡短暫而形式化，程朱學者則努力傳播，調和朱、陸的矛盾，糾正、補充朱子經注，發展疑古、考證求實的精神，充滿生機，爲宋、明間經學傳承的重要橋樑。

(二)經學家研究

一篇。福田殖〈經學家許衡---其思想的特質〉，以爲許衡（1209—1281）的思想，源自真德秀（1178—1235）、趙復（1232 前後），是重視心之工夫的朱子學，許衡認定朱子之學纔是唯一具有永恆價值之學；其學強調「治生」、「躬行實踐」；他對朱子《四書集注》成爲科舉用書、官方設立書院等事，貢獻良多。

(三)《易經》研究

五篇論文。黃沛榮師〈元代易學平議〉，謂元代經學年代，應當從一二〇六年起，至一三六八年止，在此時期內成書者均屬之，共約二四〇種，存世五十七部，文集、序跋中相關之論亦應記入。元代解《易》方式有三：(1)、注解經傳，闡明義理而及於《易》例；(2)、闡明筮法、象數、圖書；(3)、雜論。思想特色有二：(1)、闡釋朱子易學；(2)、折衷程、朱易學。以爲元代易學成就較佳者有：俞琰（1258—1314）的義理和象數並重；吳澄（1249—1333）的還《周易》古本面貌和對〈易卦〉之句讀等。鍾彩鈞〈胡方平一桂父子對朱子易學的詮釋〉，指稱胡氏父子易學，在思